

叶辛代表作系列

家教



叶辛代表作系列

家教

(苏)新登字 007 号

家 教

作 者：叶 辛

责任编辑：周鸿铸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滨海县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2 插页 2

字数：260,000 1995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300 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—5399—0761—4/1·726

定 价：11.00 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总 序

· 叶辛 ·

那是一些难以忘怀的岁月。

记得是插队落户时期，在云贵高原的偏远村寨上，连年累月地栖居在茅草屋里，守着一盏煤油灯，提起笔来用小说的形式写下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思考。当年的一切似乎都还历历在目，一晃，竟是二十多年过去了。

二十多年时间里，除了工作、旅行、开会、出访之外，我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写作上，不分节假日，时常地也不分白天和黑夜。从村寨移居到山青水秀的水电站，从山高谷深的荒蛮乡间搬进省城，最后又从内地省城回归繁华喧嚣的大上海，生活环境一次又一次地改变，但是一支笔、一张纸、一瓶墨水的写作方式，始终没有变。写作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，创作更成了我生命意味的一种体现方式。

如同农民在泥土里插下种子，勤奋耕耘，到秋后总会有收获一样，我的创作劳动也收获了一批又一批的果实。二十多年里，我出版了三十多本书，其中有二十多本是长篇小说。在这二十多本长篇小说中，不乏可读性甚强的一些书，比如《我们这一代年轻人》《风凜冽》《省城里的风流韵事》《私生子》等等，这些书有的曾被电台多次广播，有的被改编成电影，有的再版过多次。但在所有这些长篇小说中，《蹉跎岁月》《家教》和《孽债》无疑是其中影响最大和最受欢迎的，可说是我的代表作。

现在能把这三本书集中起来推出，对我和关注我的千百万读者都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。

从去年开始，我像很多作家一样改变了用笔写作的习惯，而开始学习电脑。经过近一年断断续续的熟练过程，我基本掌握了这一新的思维和写作方式，并且在创作上我也开始一点新的尝试。在重新开始迈向新的目标之前，回顾和总结以往的创作，对我就更显得重要和有一种深沉的意义。

愿生活赐给我灵感和智慧，愿我的一系列新作也像这三本书那样受到读者朋友们的关心和支持。

谢谢！

往事的阶梯

· 叶辛 ·

往事如烟。

烟霭雾岚之中，还是能依稀看出那一级一级的阶梯。就仿佛雾涌峰浮的巍巍山岭间，砌起的供人攀登的石阶，曲曲折折，弯弯拐拐，时而通向岭巅，时而直落深谷。不论这石阶多么崎岖难行，不论这石阶盘山绕坡地时常没入草丛，不论这石阶缓缓起伏地通向遥远天际的什么地方，人们照样还是能辨别出来，这是崇山峻岭间的路。

人生的路不也是如此嘛。

九月二十二日，一九八〇年。

这是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日子。对我来说，它却有着另一种意义。

新华社用刻苦自学成为作家的标题对我进行了文字和照片报道。全国二十二家报纸刊登了这条新闻，中央人民

广播电台同时播送了我近十几年的经历……

我像在做梦。清晨，妹妹又同每天一早那样，把自行车扛下楼去准备上班。忽然她又像疯了一般跑上楼来，手里拿着家里订的《文汇报》，报纸上用大字标着我的名字，她激动得大叫：“哥哥、哥哥，你的名字。弄堂里所有的人都拿着报纸站在后门口……”

在我们居住的那条弄堂里，几乎每幢楼都订有《文汇报》或《解放日报》，而上海的日报，照规矩都是在清晨八点以前送到订户家里的。我接过报纸，坐在沙发上，默默地读了一遍。我几乎不相信首都东直门外那座垂柳依依的幽静院落的采访，竟会变成上海报纸上的这段文字。

我的心情也很亢奋。

八点钟，像往常那样打开收音机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播新闻，新闻广播中，大约有五分钟，讲到了我。故乡对它的儿子，永远是怀有感情的。

自那以后，常有热心的青年朋友们来信，询问我的经历，询问我所走过的路，打听该以什么方法自学，怎样成为一个作家，怎样变成一个栋梁之材，甚至还直接了当要我讲出成为作家的秘诀。我能回答的，只能是我所走过的路，一段短促的路而已。

十月，一九四九年。

随着共和国诞生的礼炮声，我出生在上海的一条弄堂深处。那时的上海，真可说是五方杂处，百业纷陈，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。而我，大概只会张开嘴巴哇哇地放声大哭。

九月，一九五七年。

和很多满了七岁的孩子一起，我背着书包，走进了家对面的那所小学。这所小学的名字，是我至今为止仍认为是世上最好的：中国小学。

我的家住在离解放前叫“跑狗场”、解放后改称“文化广场”很近的地方。

斯大林逝世时的追悼纪念，是我幼年时期留下的唯一印象。我家所住的那条马路上，停满了各种各样的汽车，车上插的旗帜上，还绣有列宁和斯大林的像。

八月，一九六一年。

暑假又来临了，上海的暑假仍是照例的炎热难耐。是像往年暑假那样，打弹子、抓蝉、玩“官兵捉强盗”的游戏、斗蟋蟀、泡在游泳池来消磨吗？

不，我觉得不满足了，我想另外干些什么。作文课时，老师出过一个题目《我的理想》，我糊里糊涂写了一篇什么玩艺儿交上去，敷衍了事。但是我的脑子里，却在认真考虑，长大了干什么呢？

生活，留在记忆里的生活，比这更早一些就似乎开始了。

三年级时，《中国少年报》上连载了陶承同志的《我的一家》，老师每星期给我们念一节，边念边讲解，生怕我们不能理解。我嫌她太罗嗦，等的时间太长，自己掏零用钱买了一本，囫圇吞枣地读了一遍，读懂了一半。从此以后，在我众多的喜好中又添了一件事：读有趣的书。这年暑假

里，学校开展红领巾读书活动，每个班级分到好多书哟，个个同学都可以借，只要如期归还就成。

我借了一大堆书，每天早晨坐在窗台上读两三个钟头。到暑假结束的时候，书籍成了我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我觉得其他的喜好在消失，而读书的欲望却与日俱增。

就是在书本里，我知道上海是东方大都市，黄浦江在吴淞口流入浩瀚的东海。也是书本教会了我观察，我看到那条名字动听的苏州河太脏了，河水就像粘稠的污水，走近河岸便有股难闻的腥臭味。

书籍给我打开了通向未来的门户。书本以它绚丽多姿的意境给我展示了一幅又一幅动人的图画，给我叙述了一个又一个哀婉的、扣人心弦的故事。

谁没经过少年时代，谁又没在少年时代做过那么多充满幻想的五光十色的梦啊。我幻想着长大了去航海，战胜惊涛骇浪；我憧憬着未来去登山，越过雪山冰川；我认真地思考着，当了司令员以后，怎样像夏伯阳那样指挥千军万马去打仗……有趣的荒诞的梦，离我真正地爱上文学，还有一段距离。

记得，那是我读过《童年》之后，我沉浸在书本描绘的生活中，久久地不能平静，好像有什么东西，叩击着我的心扉一般。我暗自思忖着：那些发生在外国的事情，怎么我竟像看见过一模一样呢？我抚摸着书的封面，第一次想到写书的人，第一次感到写书的人是了不起的。看这个耸起额头的外国老头儿呀，他写出的书感动了我这个中国小孩子。我仔细端详着外国老头儿的相貌，突然像被火烫着似地跳了起来：我见过这个人，见过这个人的。在哪儿

碰见这个人的呢？想了半天，总算想起来了。在上海市少年宫的阅览室里，这个人的像画得好大，和鲁迅先生的像挂在一起。

仿佛就是从那以后，我开始想到，我长大了，也要当写书的人，也要去感动那些读我的书的小孩子。

哦，一个多么美好却又难以达到的愿望呵。

七月，一九六五年。

在中学里念了两年，我家就搬市中心去了。那儿离黄浦江很近，紧挨着驳船簇拥、水流混浊的苏州河。每当黄昏和清晨，只要空闲，我总是走上五分钟路，到苏州河边去看船民们的生活。

对我来说，那完全是另一个世界里的生活。看得出，船民们是贫困的，他们在小船上煮饭、擦舱板、喝水。即便坐在乌篷下喝酒哼小调，他们小桌上的下酒菜也是极简单的。岸上便是繁华的大都市，什么吃的、用的、花销的、享受的东西都有，他们却仿佛同这一切不相干似的，只知道装船、卸船，只知道劳动。

中学生活还给我留下一个印象，那就是说话、做事都要谨慎小心，注意阶级斗争。说错了话，是要被批评的，重的还要挨批判。在我们班上，班主任喜欢根据学生的家庭出身、本人是否积极参加学校的活动、班上的活动以及对她的态度，来给学生划分左、中、右。在班主任及先进学生的眼里，经常参加班级、学校组织的歌咏活动、大扫除活动、出黑板报活动，那就是思想先进的学生；反之，埋头学习，认真读书，对各类活动不怎么关心的学生，哪怕

你学习成绩再好，也是在走“白专道路”，至少是只专不红，需要帮助和教育。我因为经常看一些厚本的书，而这些书的扉页上常印着一些大胡子、长头发的外国作家照片，而被老师视为不安分的学生。

不言而喻，由小学到中学，我读了差不多能够到手的所有的书。书本要我学做一个正直、诚实的孩子，不要撒谎，不要人云亦云，不要阿谀奉承，要脚踏实地独立思考；书本开阔了我的眼界，使我知道除了繁华热闹的上海之外，世界上还有壮丽的河山和无数奇妙无比的事物；书本也陶冶了我的精神，我在书上读到“人只有献身社会，才能找出那实际上是短暂而有风险的生命的意义”（爱因斯坦）等等一类格言警句，并且铭记在心。书本中好多精彩的景物描写，人物刻画，我都不厌其烦地抄录下来，同时，每读一本书，我或多或少写下一点笔记，谈谈我读这本书的感受、体会，以及我喜欢它哪些方面，不喜欢它哪几处。自然，书本使得我向往丰富多彩的生活，向往有山有水的大自然。

我对前途的看法简单极了。上完初中、上高中，高中毕业考大学，并且要考文科，争取大学毕业以后，当一个作家。还是在小时候，我就听说，一个人长到十六、七岁，就要准备走向社会、准备独立生活了。因此，我怀着一种迫切的心情盼望自己快快长大、快快长大，以便早日奔向广阔的生活天地。

可眼下，满十六岁了，我却茫然不知所措。

六月，一九六六年。“红色风暴”惊醒了我升高中的梦，

不但升不了学，连及时毕业也不成，都留在学校里，停课闹革命。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向社会迈步。

我虔诚地、狂热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去。看大字报、抄大字报、写大字报，把学校里、社会上看到、听到的一切，几乎是不加选择地记在一个小小的四四方方的本子上，随身携带着，那是我的日记，也是我对生活最初的思考。所谓闹革命，就是打着红旗游行，欢呼一次又一次最高指示的发表，欢呼《红旗》杂志一篇篇社论的发表。其余的时间，便是跟在宣传车后面捡传单，为破“四旧”的“革命行动”大声叫好，为揪出一个又一个层出不穷的“牛鬼蛇神”而振奋，整夜整夜不睡地去大专院校看大字报。我只觉得，整个身心的血都因为投身于这场伟大的革命而沸腾……

沸腾的“革命”才进行了几个月，一种茫然的情绪就不知不觉地向我袭来。我看到造反的红卫兵们拿着体操棒、铜头皮带打破了我同学的头，只因为他父亲解放前开了一个小糖果铺；我看到那些高呼革命口号的红卫兵逼着“走资派”在熊熊的火堆旁爬，而火堆里烧的，又都是我爱读的书。至于揪头发，戴高帽子、游街示众，砸烂学校的墙壁、拆毁课桌椅、洗动图书室、敲坏玻璃窗、拿着体操棒搞“文攻武卫”、斗“黑七类”子弟、开辩论会、打语录仗……已经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了。

这难道就是革命？我疑惧地退缩了。我把困惑埋在心头。

原先对班级里的歌咏活动、出黑板报活动就不感兴趣的我，对这样子“闹革命”，愈加惧而远之了。

到了六六年底、六七年初，我成了一个标标准准的逍遥派。

而所谓的革命形势，却仍在继续发展着。大中学校统统停了课，许多学校成了派仗的阵地。我读书的那所中学，也毫无例外。作为一个求知欲望强烈的学生，我已经有半年多没有打开课本了。在经历了狂热、虔诚和彷徨的半年以后，我是多么渴望着复课，渴望着进高中读书，渴望自己也像过去的很多人一样，有个深造的机会啊！可在“造反派”眼看一天比一天得势的日子里，你讲这些，就会给你戴上一顶“走白专道路”的帽子。

面对这样的事实，我只有沉默。

怎么办呢？传单、宣言、标语、口号充塞着生活的每个角落，正在打派仗的学校里是进不去的。而离家很近的南京路在沸腾，上海在沸腾。面对着一派热闹得带点儿骇人的景象，我困惑地观望着、观望着，同时又在心中暗暗打着主意，不能让大好时光白白流逝，自己给自己制定一个学习计划吧。

可以说，自学的念头，便是在那些动荡的日子里产生的。

十二月。一九六八年。

一九六六年在等待中过去了。

一九六七年又在期待中过去了。

一九六八年眼看又要在充满焦灼和不安中过去。

严冬早早地来临了。虽然没有暖气，没有火烤，我依旧在读书。还是小学里的那个愿望，支撑着我的求知的信

念。鬼知道书都是从哪儿借来的呀，两年多来，我读了那么多，世界文学名著、哲学、社会科学、地理、历史、诗歌……我是完全自由的，可以任意地支配时间。人们称我为逍遥派。而我的身旁，竟然会有这么多逍遥派，初中的、高中的、大学的学生，还有很多邻居，他们和他们的同学交换书籍，交换来以后，我就拿来读，读得很快，有时还很匆忙，我随手写下一点笔记，特别喜欢的，我就抄，通宵达旦地抄。

哦，逍遥派的日子，其实并不逍遥。

要知道，选择这样的自学方式，我还真费了点脑筋呢。

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我的各门功课都不差，我要自学，该从哪儿着手呢？全面铺开吗，几乎是不可能的，只有从单方面入手。单项入手，选择哪门课呢？数理化吗？一找不到课本，二没有人可请教，三是更主要的，对我来说，那些阿拉伯数字、公式、概念太枯燥、太乏味，学起来太沉闷了，很可能半途而废。外语吗？我倒很愿意学，身边也有几个同学每天花四个小时的时间在猛攻呢，但我总觉得，要通过自学，达到较高的水平，难度太大。唯有文学，那是我自小酷爱的，首先我有浓厚的兴趣，其次我多少还有些写作的基础，小学、中学里，我的作文不都得过奖嘛，再有书籍容易找。于是我便决定了自学的主攻方向——创作。

我这样说，决不是贬低数理化和外语，事实证明，有很多人，通过自学，在数理化和外语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。我只是想说明，一个年轻的立志成才者，冷静地分析一下主客观环境很重要。有了学习的愿望，不要盲目，不要见到什么就想学什么，更不要什么时髦赶学什么。还是从实

际出发，分析自己的素质，条件，兴趣爱好，把它们同社会的需要和可能结合起来，然后再决定从哪儿入手。一旦确定了目标，就百折不挠地往前闯，往上奔。拿今天的话来说，就是要有拼搏精神。

在默默地自学的日子里，我没有空虚、无聊的感觉。我知道这是耕耘时期，无暇顾及收获。我学习着，觉得生活很充实，日子很紧凑。确实，“夫学者不患才不及，而患志不立。”一旦立下了志向，生活有了目标，有了努力方向，就觉得时间不够用。

每天早晨起床后，我在桌前读书到吃午饭；午饭后就出去散步。我们家住得离南京路很近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南京路，所有的橱窗、墙壁上都糊满了标语、口号、大字报。从西藏中路到外滩五里路的南京东路，成了我每天午饭后散步的必经路线，我在这条路上看到很多大字报，感受到“文革”的脉搏在怎样地跳动着。我把这些也作为一本书来认真读——一本社会的大书。记不得是哪一位作家说的了，他认为一个文学青年除了要博览群书之外，更重要的是阅读社会这一本书。我就是照着这话去做的。不是吗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福气像我这样有时间、有精力的。不论刮风下雨还是烈日当空，我坚持每天午后去南京路散步，观察社会。大约三四点钟，我回到家来，在日记里写自己的点滴感受，摘录点什么，然后继续读书。晚饭后到半夜是我用来集中阅读中、长篇的时间，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、托玛斯·哈代的作品、易卜生的剧本，对我都有一股强大的吸引力。读到类似的好书时，我常常要延续到下半夜，母亲多次催促后才熄灯入睡。

在我的身旁，有好多同学都在自学他们感兴趣的学科，我们之间，志向虽然不一，但当一方需要什么书籍时，其他人就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去帮着找来。尽管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、批白专道路批得那么凶，我们这些同学的家长，对我们的学习从来都是抱赞许的态度并积极支持的。

就这样，读书，每天午后去南京路，感受书本里的精神世界，感受时代脉搏的跳动，听高音喇叭大声宣读“首都来电”，看大字报上的“××事件真相”。内心深处，一直在盼着分配、分配，怎么还老不分配我们。这天夜里，二十一日夜里，毛主席发表了又一条最新最高指示：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，很有必要。”

照例，喧天的锣鼓响到半夜，保证书、决心书、请战书、致敬电雪片样飞起。我看到了自己要走的路，暗自思忖着：上山下乡，到广阔的天地去。

我离文学之路是远了，还是近了？

我不得而知。

四月。一九六九年。

贵州终于到了。

修文县终于到了。

迎接我们的，是一场奇特的倒春雪。雪花飘呀飘呀，飘落在盘山绕坡的公路上，飘落在送我们去山寨的卡车上，飘落在连绵无尽的，对我们来说充满了神秘感的大山的脊梁上。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，可冷啦！可我们的心，却都是热乎乎的。我们终于到达第二故乡啦。

我怀着青春的热情，投身到广阔的天地里来了。

离川黔铁路的制高点十来里地的地方，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大寨子——沙锅寨。这就是我插队落户的村寨。

这儿是修文、息峰、开阳三县交界的偏僻山区，离开上海五千里路，火车要开两天两夜。在欧洲，这么长的路程，不知跨过几个国度了。初到贵州，我睁大了一双寻找田园风光、诗情画意的眼睛，真觉得如同到了异国一般。

我相信，在这儿，我是能大有作为的，初来乍到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。首先，我要自食其力，自己养活自己。我必须适应山区的生活，学会讲贵州话，逐步增大自己的劳动量，过好思想关、劳动关、生活关。然后，我要参加三大革命运动，重新安排修文的山山水水。是的，和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一样，我是抱着虔诚的愿望来接受再教育的。

看嘛，壮丽的山川河谷，山乡的风土人情，和上海截然不同的生活环境，充满了乡土气息的民风民俗，带着浓郁韵味的贵州话。不跑到山寨来，我能知道这一切吗？我来对了，我是离文学之路近了，近了，我要写。

七月。一九七〇年。

写，谈何容易啊。插队落户的知青点茅屋里，放下四张床，就找不到放桌子的地方了。到了晚上，没有电灯。再说，白天还得虚心接受再教育呀，劳动又有多累人哪。挑粪、耙田、铲田埂、钻煤洞挖煤、在土砖窑上当小工、背灰、打煤巴、薅秧薅包谷、扯谷子、挑窑田水、敷田埂……一天干下来，回到集体户，最好脚也不洗，裹一张毛巾倒在床上便睡。

这些，倒还在其次，我可以设法克服。没有桌子，我